

黄泛区农场里的“多国部队”

回李郁

1952年底，黄泛区农场来了一批特殊老外，他们不是来支援农场建设，也不是来参观学习，而是因战败来农场劳动改造的“多国部队”。其中既有参加侵略中国还没遣返的日本人，也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国、比利时的大兵，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两名我方翻译人员。

他们来到黄泛区农场后，分别被安排到第六作业站、修配厂和面粉加工股。这批来农场改造的外国人刚到农场，随后到的是许昌专区（当时西华扶沟属许昌专区）公安处二科科长余文俊，专门负责来农场外国人的劳动改造、思想工作和安全工作。余文俊来农场后任农场修配厂党支部副书记，住在场保卫科。

到六分场的3个日本人是中村和上三母子，他们的中国话说得很好，特别是上三，听不出他是日本人。中村是专门从事汽车维修的技术人员，到农场时有50多岁。一次一台苏联造的纳旗机车的诱导轮里的轴坏了，场里驾驶员和修理工看后，都认为没法修了，但还有不少地没犁，一时大伙儿都很着急。中村认真察看后问：“犁地的干活儿，还有几天的可完成？”给他说他还需要一个星期，他思索了一阵子说：“把机器拆开，铁的坏了就用木头的，一个星期的可以。”大家一听，都不相信，铁家伙儿用木头代替，他真能想得出来。结果，拆下铁轴，用硬木打在里面，装好后，开着下地了，过一个星期地犁完，也没出现问题。还有一次一台机车汽门儿烧得变了形，又是没法修。中村看后对上三说：“我们的干，明天的干好。”当时，驾驶员都想看看他能出啥洋点子。他先找到了一个比车上的汽门儿大的旧汽门儿，两个人钢锯子一点点地凿，把变形的汽门儿剔圆，把大些的汽门儿换上。俩人连夜不吃饭不睡觉，在没车床没铣刀的情况下，硬是修好了。

苏联产的机车都有很正规的说明书，某部位坏了，不是四级工不能打开；某部位坏了，不是三级驾驶员不准修理等。中村不信这一套，说：“什么的不能打开，给我打开。”发动机的瓦片烧了，他想办法修。他说一台机器如果坏了，哪怕是修好能多用一天，也要把他修好。农场职工对他们的这种敬业精神 and 修理技术还是都很佩服的。

中村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因为当时我们的驾驶员和修理工都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对机械知识和技术从理论上、实践上都知之甚少。当中村了解了我们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机械技术水平后说：“你们的，中国人的不行。”驾驶员们说：“我们的不行，把你们日本的打败了。”他不急不躁地说：“不，不，不是你们中国人把我们打败了，是美国把日本打败了。”尽管他作为一个战败国的公民在我国改造，可是从他的言行中无不显示出他对自己国家的自信和不服输的精神。

上三的父亲是一个战争罪犯，他的母亲因年纪较大，到六分场后很少参加劳动。中村和上三的母亲明里各住各的房子，但暗中两人同居，场里人都知道。上三到六分场时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跟着中村学习机械技术，他对中村很好，



师徒两人形同父子。

在修配厂劳动改造的3个日本人是河野、山森和安田福。3人中河野的技术水平最好，山森最差。河野的专业是机械制造，钳工技术很棒。他和中村一样，在1931年的“9·18”事变时奉命来到中国，他常说上司叫来不能不来啊。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他专门从事坦克维修。河野到黄泛区农场时近60岁了，人很本分，工作起来特有耐心，可是身体不好，不能从事重体力活儿。有时有机车大修，他也主动上前帮手。为了照顾他，修配厂给他安排了些较轻的劳动，让他用白铁皮做油壶或洗零件用的油盆之类，他自己绘图、自己下料、自己焊接，做出来的东西精致美观，小油壶做得像线条优美的艺术品。有一次，他从废品堆里检出一个水箱，有人告诉他坏得不能用了，他却坚持要修。水箱散热那地方，密密麻麻的都是孔，有一个孔坏了都不能用，大家都想看他咋修。他找了一段塑料软管，按照不漏气就不漏水的道理，用口吸的办法，有的还要用手捂住小孔的下面。那么多孔他一个一个地试，全部试完后，他说：“可以修啊，只有一个孔漏气啊，修好和一个新水箱一样用，扔了多可惜。”很快，他把那个漏气孔焊补好，水箱又重新装到机车上。

来黄泛区农场的外国人中，河野是最想回国回家的人，他常拿出家里的照片久久不放下，还给别人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孙子，他们都在老家。”有一个不到20岁的女工常听他思国思乡想念亲人的诉说，并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他一些帮助，他对那个女工非常感激，就对她说：“中国人对我很好，把你的照片给我一张吧，走到哪里我都能见到你啊。”他离开黄泛区农场后，这张照片不知在哪里被发现并扣下来了。省里还把这事转达到农场，农场领导把那个女工狠批了一场。

3个从事医务的日本人被安排到了农场医务所。一个女护士叫门川福枝，一个女药剂师叫仲村然。场里人叫她俩的名字觉得别扭，就给起了新名。门川和门栓谐音，而门栓的俗名又叫门插儿，于是大家都喊她“门插儿”；而仲村然和“门插儿”是同行姊妹，大家都喊她“门搭儿”，至于真名字，很少有人知道。而她俩也乐意大家这样称呼她们。医务所里还有一个日本的男检验师叫矢危弘，他们3人都30多岁，同是来自开封医院。

有一天，矢危弘跑到保卫科大

喊大叫，手里还掂着一根棍。翻译很快过来劝说，原来他在喊“快送我回国，我要回我的祖国。”

仲村然和丈夫山森有个几岁的男孩子。山森脾气不好，不许孩子学中国话，可是那孩子不听老父亲的话，还和他对着干。有一次，山森不让儿子说“吃饭”，教他的儿子说“米西、米西”，那孩子大声说“吃饭、吃饭”，一下子惹恼了山森，就把儿子狠狠地揍了一顿。

日本人崇拜美国人，认为是美国人把他们打败了，所以就佩服美国人，认为美国强大，谁强大才值得学习。1954年过春节的时候，日本人请美国青年吃饭，还买了酒，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半夜时，山森送几个美国青年回住处，场里人对他们在一起吃喝非常反感，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又吼又叫。警卫拿起枪，“哗”的一声上了膛，美国人陆夷、贝尔和考华特吓得屁滚尿流，赶快爬到雪坑里躲了起来。可是山森不怕，挺身迎枪而上。领导过来狠狠批评了他们酗酒的行为，才给他们开了门。

3个20多岁的美国人都花花公子，他们是高中毕业参军，在朝鲜战场被志愿军俘虏的。在农场虽说当战俘，也能享受当战俘的快乐。他们认为当兵打仗和当战俘都是为了国家，一样光荣，美国人对美军被俘人员从不歧视，美国的战俘还有晋升为将军的。3个美国青年有文化，很爱玩、能唱歌、能弹琴，很会享受，身为俘虏却毫无失败感、耻辱感。有一次，贝尔理了一个上部剃光、留下下部头发的发型，职工都用不屑的眼光看他，但他并不在意，很有个性。

农场规定他们不能离开场区，这也是考虑到他们的人身安全问题。高个子考华特在修配厂劳动，他没什么技术上的特长，就让他洗洗机器零件，或者擦擦机车上的油污、拾些东西。有一天，他神使鬼差地离开了修配厂，踏着厚厚的雪从总场部向西跑了。当时场里没谁在意，当他跑到逍遥东的时候，被民兵发现了。持枪围追上来的民兵看到他也吓了一跳——谁家的孩子长这么大的鼻子。问他，他也不说话，当时认为他是从天上来的国外特务，说不定近处还有降落伞呢。一想到是来破坏的外国特务，大家都感到事情重大，五花大绑地把他押了起来，这样，考华特再次被俘。西华公安局接到逮住一个“外国特务”的消息，知道农场有外国人，立即和农场联系。考华特被押回农场松绑后，农场立即对他进行了讯问，他也交待了让人啼笑皆非的“逃跑”动机。

当时中南局在黄泛区农场二站（现在的二分场）办中南局机械训练班（现在河南省机电学校的前身），来自各省的学员轮流到修配厂实习。其中一个姑娘在实习中和考华特相识，她性格外向开朗，两人经常在一起说笑，出于对这个老外的好奇，

常问这问那，没想到一来二去考华特喜欢上了这个姑娘。她实习结束离开修配厂又回到训练班，考华特难以放怀，决心到训练班找她一诉衷情。他只知道训练班地址在总场部的西边，并不知确切位置，他知道有不许他们任意出场区的限制，又不敢问路，就一直向西走，民兵发现他时，他已走过了二站。对于一个在异国他乡的外国人来说，爱上一个异国女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姑娘是根本不会爱上一个同中国作战的敌国俘虏的，考华特只是单相思罢了。

美国青年陆夷、贝尔和比利时青年在面粉加工股劳动。当时，农场用钢磨加工小麦面粉，拖拉机引擎作动力，每天可磨6000多斤小麦，供全场职工吃面。3个人在面粉股劳动时就好像3个哑巴一样，多是看眼色行事，厂里的职工要是有人去抬麻袋，他们马上过去到麻袋的那一头去抬，有时他们坐在那里休息，如果有人拿起铁锹去干活，他们马上起来过去拿铁锹干活。劳农场职工用最原始的手语同他们交流，比如要用水滋润麦子，对他们伸出一个指头，他们马上出去提一桶水过来；如果伸出两个手指，他们就到外边挑一挑子水过来；当带班的对他们举手向外一挥，他们立即就向外走——知道这是让下班。时间一长，双方慢慢也都习惯了。

事情过去50多年了，当年和几个外国青年在一起磨面的老职工回想起来，还称赞3个青年能干，不省力，特别是两个美国人，个子都1.9米高，力气大，磨面时往阁楼上扛麦包是重活，他们从不偷懒，一百多斤的麦包往腋下夹就上楼了。

日本人各有各的住处，可以自己做饭吃，山森还有家属。几个美国青年和比利时青年是单独吃住，场里专门给他们找了炊事员开小灶，每天每人享受两角钱的伙食补助，比职工大食堂的生活水平要高，生活方面确实受到了优待，他们不习惯面食，又想法给他们弄了大米。

几个外国青年还常和职工在一起娱乐、打篮球。平时，他们也都比较谨慎，从不多说话，更不说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话。

比利时的那个青年，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年纪、个子都小，大家都喊他“小比利”，他也默认了这个中国名字。比利时的部队是随着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侵入朝鲜的，“小比利”被俘后又随多国部队的俘虏来到中国。在农场的“多国部队”里，“小比利”个子虽低，而文化水平是最高的，他会英、法、德、意四国语言，人也很老实，沉默寡言，在农场几乎不说话，和他们的翻译交流都很少，不像几个美国青年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同翻译说很多话。

1955年元旦过后，他们奉命离开黄泛区农场。他们走前，女职工烙了不少焦馍，让他们带着路上吃。临行的前一天开欢送会，他们作了真诚的答谢，感恩中国人对他们的优待。医务所还按中国人的风俗为他们饯行。送他们去漯河火车站的拖拉机一开动，他们一起挥手向送行的人致意，用中国话说“谢谢、谢谢”，职工们热烈鼓掌，祝他们一路顺风。

至于他们离开黄泛区农场又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各自的祖国和他们的家人团聚。

农场的“多国部队”走后，余文俊也离开了农场，出任扶沟县公安局局长。



相关链接

黄泛区农场

黄泛区农场的诞生与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密不可分。

1938年6月，侵华日军占领豫东重镇开封后，大举西进，威逼郑州、武昌。国民政府以阻止日军为借口，以水代兵，悍然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滔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豫、皖、苏3省44个县89.3万人丧命黄泉，1200万人流离失所。到1946年黄河封堤，黄水整整泛滥了8年。8年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人为地造成了54000平方公里流沙弥漫的“黄泛区”。“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劫难后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重视黄泛区的复兴工作。1950年2月，中央成立了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同年3月21日，在河南省省会开封设立办事机构——黄泛区复兴局，省主席吴芝圃兼任局长，赵一鸣、路岩岭任副局长。并由国家拨出专款，开始了大规模的向自然开战、建设家园、造福子孙的“复兴”运动。

在短短的一年中，复兴工作大见成效，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许。周恩来总理在听取复兴局汇报情况后指示：结束复兴工作，地可以按户分给农民，地多人少，农民分不完，黄泛区可以建个大农场嘛！于是在中央和河南省政府的关怀下，经过短期筹备，1951年1月，黄泛区农场正式建立。

在黄泛区这片沸腾的热土上，一批批优秀的农垦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发、创造、巩固了新生的国有机械化农场，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农垦精神，铸造出黄泛区的辉煌。如今，经过50多年的发展，黄泛区农场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土地面积9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0.2万亩，总人口3.02万人，职工15000人，下辖28个农工商企业，6个股份制企业，4个场管行政村，22个行政事业单位，1个正团级武装部，1200多家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13个周口市、西华县驻场单位的省属大型一类国有农垦企业。场属总资产5.4亿元，年产值7.5亿元，年创利税3000万元。农场已成为河南省最大的农作物良种繁育、推广基地，果蔬生产、加工、贮藏基地，生猪养殖、出口基地，过磷酸钙生产基地，船舶和化工缸套生产基地。

60多年来，黄泛区农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1965年被农垦部命名为全国八大样板农场之一；1979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受到国务院通报嘉奖；199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称号；2000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03年被农业部命名为“全国种业五十强”；2004年5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

（本报综合）



周口市旅游局邀您同行

看周口
读周口
品周口

西华篇(二)